

浅析马援铜柱的地望及其性质

李御和 李鹏

(暨南大学 510632)

摘要 马援铜柱，多见于历代史书记载，为东汉大将马援平定交趾叛乱后所立。在长期流传中，不乏历代名将在征战胜利后效仿马援立下铜柱。马援铜柱被赋予丰富的内涵，具有特殊的性质。本文拟以考察马援铜柱的地理位置，讨论其性质，探讨以马援铜柱为代表的古界碑铜柱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上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央致力于大一统王朝秩序建构的努力。

关键词 马援铜柱；地望；性质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7.197

马援，字文渊，扶风郡茂陵县（今陕西省兴平市）人，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将领，东汉开国功臣，称“马伏波”。后世传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在平定交趾徵氏叛乱之后，于交趾之地立下铜柱。学界对这一史实颇具争议，对马援铜柱所在的具体位置也说法不一。本文拟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再结合史料进行梳理，主要探讨马援立铜柱这一历史事件，并试论马援铜柱的性质及中央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秩序的建构。

一、马援铜柱地望考释

“武帝时作铜柱，裸露仙人掌之属。”汉时封建王朝已铸有铜柱。而关于马援铜柱位于何地，史书记载并无统一说法，据《岭外代答》载：

汉马伏波平交趾，立铜柱为汉极南界，唐马总为安南都护，夷僚为建二铜柱于伏波之处，以明总为伏波之嗣，是铜柱在安南矣。又唐何履光定南诏，复立马援铜柱。按南诏今大理国，则是铜柱复当在大理。又占不劳之地，南有大浦，有五铜柱，山形若倚盖，西重岩，东崖海。按占不劳今占城也，然则铜柱又当在占城。闻钦境古森峒与安南抵界，有马援柱，安南人每过其下，人以一石培之，遂成丘陵。其说曰，伏波有誓云：“铜柱出，交趾灭。”培之惧其出也。又云，交趾境内有数铜柱，未知孰是。

此段史料指出马援平定交趾叛乱后，于此地立铜柱为“汉极南界”。而唐何履光立铜柱时言及立于马援铜柱故处，所立铜柱位置则在南诏大理国，与上述马援铜柱位置不符。材料所说马援铜柱可能所在的多个位置，分别为安南、大理、钦州三地。《岭外代答》成书于南宋时期，因此，安南汉时即交趾之地，大理汉时即南诏之地。

西晋张勃的《吴录》“象林海中有小洲，生柔金，自北向南行三十里有西属[屠]国，人自称汉子孙，有铜柱，云汉之疆场之表。”是关于马援铜柱最早的史书记载，虽然原文未有指出是马援所立铜柱，但是该记载被列于“汉柱”条之下，并且其地点符合马援南征所到之地。西晋人所作《广州记》曰：“援到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明确记载了马援所立铜柱在交趾，铜柱为汉之边极之界，查西汉交趾刺史部地图¹，马援所立铜柱应在日南郡，然《广州记》作者说法不一，无法考证其说来源。又《水经注》：“建武十九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晋书·地理志》载，象林“今有铜柱，亦是汉

置此为界”。《隋书·刘方传》载：“方进过马援铜柱南行八日至林邑国都，刻石记功而还。”“林邑国本汉时象林县，则马援铜柱之处也，去南海三千里。”¹隋将刘方征服林邑国，于此地设置林邑郡，此地乃西汉日南郡象林县。因此上述几则史料均表明，马援所立铜柱位于日南郡象林县（今越南中部）。

《陔余丛稿》载：

马氏铜柱有三。马援所立铜柱在林邑国，《唐书·环王传》：“本林邑地，海行三千里至其国，南有大浦，援所立五铜柱在焉。援留十户于其地，隋末蕃衍至三百，皆姓马，俗号为马留人。”此汉时所立铜柱在交趾者也。“马总为安南都护，建二铜柱于汉故处，剿著唐德，兼以明伏波以裔。”此唐时所立铜柱，亦在交趾者也。

赵翼认为马援铜柱在林邑国，即上述提及象林县。唐时马总所立铜柱为追己为马援后裔，亦在交趾境内。

《晋书》《隋书》成书于隋唐，时间较早，《后汉书》对于马援南征交趾徵氏叛乱有着详细的记载，且林邑之地符合“汉之边极之界”。而赵翼为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派大家，治史时每每胪列众多相类似的史实，并对其进行考证，互相勘校，以史证史，²撰写出考证史籍著述《廿二史札记》，其论述可信度较高。因此，马援所立铜柱最有可能位于交趾日南郡象林县。

此外，关于马援铜柱的位置，唐以后的史料亦有不同说法。南宋《舆地纪胜》载：“钦州古森筒与安南接界有马援柱，安南人过其下，人以一石培之，遂成邱陵。”按此说，马援铜柱在钦州境内，较之汉时在象林县，中国与安南的边界位置则大大北移。明《广志绎》载：

铜柱在钦州分茅岭之下，汉马伏波立以界钦州、安南者。或曰柱乃在安南境中，援当时誓云‘铜柱折，交人灭。’今交人过其下，每以石培之，遂成丘陵，惧其折也。又有古铜鼓，蛮人重之，今廉、钦村落土中尝有掘得者，亦云马伏波所余。

王士性《广志绎》关于马援铜柱的位置有两种说法，一设在“钦州”，言及此铜柱为“界钦

州、安南”，然钦州并不位于汉时中国与安南的疆界，此说不成立。

综上所述，结合《溪州铭文云》转载有东汉马援象浦铜柱铭文40字：“金人汗出，铁马蹄坚；子孙相连，九九百年。

是知吾祖宗之庆，胤绪绵远，则九九百年之运。昌于南夏者呼？”笔者认为马援立铜柱确有其事，并且马援铜柱位置非在云南安宁城，亦非在钦州，而在日南郡象林县（今越南中部）内。

二、马援铜柱的性质

（一）界碑

汉代马援立铜柱一事，东汉以后史书多有记载，且后世对马援铜柱多有附会。尚存于世《溪州铭文云》：“我烈祖昭灵王，汉建武十八年，平徼侧于龙编，树铜柱于象浦。”³关于昭灵王，学者说法不一，彭武文认为此铭文中的昭灵王即为马援；⁴叶德堡认为昭灵王并非指马援，但是铭文中的“烈祖”即指马援。⁵总之，溪州铭文所载内容与马援有关。马希范追称马援为其祖上，马援南征交趾为汉时镇抚边疆之壮举，而马希范征五溪蛮亦是壮举，可见马希范对于其祖先马援的崇敬。在与彭士愁的溪州之战结束后，马希范效仿马援立下铜柱，用于与彭士愁所辖的势力范围为界，因此溪州铜柱的性质可谓战争结束的和平标志，亦是两个不同政权之间划分疆界的界碑铜柱。而溪州铜柱乃马希范效仿马援立铜柱之事，则马援铜柱的性质亦是如此。

（二）记功碑

除马希范附会马援立溪州铜柱外，亦有隋刘方、唐何履光效仿马援立铜柱。《隋书·刘方传》载：“方适过马援铜柱，南行八日至林邑国都，刻石记功而还。”¹刘方乃隋朝名将，“性刚决，有胆气”，在对林邑国作战时，充分展现了其果勇和谋略，且战无不胜。马援为东汉时征交趾名将，封新息侯，后世称“马伏波”。显然，同为征交趾将领，刘方对东汉马援亦具有崇敬之情，刘方征林邑国后于马援铜柱旧故处刻石记功，希望像马援一样能够立下功勋，声名传世。又《新唐书·玄宗纪》载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十月，“是岁，特进何履光率十道兵以伐云南”。²何履光在唐玄宗、肃宗朝时任都督、特进等职，“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复立马援铜柱，乃还。”³虽马援铜柱已考证不在南诏，但是何履光在出兵平定南诏之后，亦以附东汉马援的名义立下铜柱，可谓马援立铜柱一事在后世平定边疆战争的将领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各代将领纷纷在战时平定时立下铜柱，追溯马援之功绩。可见，马援铜柱无论是其在东汉时或者后世的映像中，并不只是立于某地简单的实物铜柱，而是被赋予了丰富的涵义。马援铜柱应为东汉政权与越南政权的界标，具有界碑及记功碑的性质。

（三）维持疆界稳定的标志

马援铜柱除了具有界碑与记功碑的性质外，还具有维持疆界稳定的性质。《广东新语·铜柱界》载：“铭之曰：铜柱折，交趾灭。交趾人至今怖畏。有守铜柱户数家，岁时以土培之，仅露五六尺许”。⁴为了保护所立铜柱界碑不被破坏，亦采用了较为巧妙的办法，于铜柱上镌刻铭文“铜柱折，交趾灭”作为诅咒，使交趾人不仅不破坏铜柱，反而将其小心翼翼保护

起来。直至明清之际，“今虽山川移易，铜柱湮沉，而蠢尔跳夷，犹惴惴然以遗讖为忧，不敢埋没故迹，盖震慑将军之威灵若此”。⁵因此，马援铜柱界碑对后世影响深远，发挥着跨朝代的界碑作用，维持着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稳定秩序，其意象已远远重要于铜柱本身。

三、余论

马援铜柱至今历时近两千年，为后世史书多所提及和后人多所效仿，实乃因为其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华夷秩序”是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一种国际关系，古代中国是“华夷秩序”的主宰，因此古代中国边界是以一种朦胧的感觉存在着。因此，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的交趾豪族造反可视为其作为古代中国的藩属国对“其自身利益及身份定位的认知”产生变化且想由此突破中原王朝对其身份的定位。而中原王朝感知到其控制的地域范围受到挑战，作出的反应则是派马援从海路进讨交趾叛军。此后，平定其叛乱，立铜柱为界碑，是为警示和征服的代表，原本朦胧的边界则转化为有物可寻的较为清晰的边界。

参考文献

- [1]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交趾刺史部》，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5-36页。
- [2]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十七《南蛮》，中华书局，1974年，第2545页。
- [3] 孙亚丽：《从〈廿二史札记〉看赵翼的史学思想与方法》，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 [4] 彭武文：《中国古铜柱铭文通论》，岳麓书社，2009年，第39页。
- [5] 彭武文：《中国古铜柱铭文通论》，岳麓书社，2009年，第3页。
- [6] 叶德堡：《溪州铜柱铭文中“昭灵王”刍议》，《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 [7] [唐]魏征等撰：《隋书·刘方传》卷五十三，中华书局，1982年，第1358页。
- [8]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玄宗纪》卷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147页。
- [9]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南蛮传》卷二百二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6270页。
- [10]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卷二《铜柱界》，中华书局，1985年，第39页。
- [11]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卷二《铜柱界》，中华书局，1985年，第40页。

作者简介：

李御和（1995-），女，广东汕头人，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地理；

李鹏（1996-）男，湖北荆门人，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政治地理。